

#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

陳元朋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統一編號

006359861121

ISBN 957-00-8895-8



9 789570 088953

#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

陳 元 朋

陳元朋君，民國五十七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就讀本校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本論文由王德毅教授指導。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一〇四：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主編者：李偉泰  
古偉瀛

著作者：陳元朋

發行者：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久忠實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ISBN 957-00-8895-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陳元朋  
著.--初版.--臺北市：臺大，民 86

面；公分.--（文史叢刊；104）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00-8895-8（平裝）

1. 中國醫藥 - 歷史 - 宋 (960-1279)

413.09205

86003708

#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民國以來「中國醫學史」研究方式的省思 ——以本國學界為中心的論述	1
第二節：關於宋代「士人習醫」與「儒醫」 問題的研究回顧與討論	24
第三節：基本觀點與各章節概要	38
第一章：宋代士人「尚醫風氣」的形成原因	45
第一節：宋代士人「尚醫」的物質條件 ——傳統醫學知識傳承方式的轉變	48
第二節：宋代士人「尚醫」的現實因素	81
第三節：宋代士人的「尚醫」思想	103
第二章：宋代的尚醫士人	113
第一節：兩宋尚醫士人的醫學知識掌握深度	115
第二節：宋代尚醫士人的醫學著作	130
第三節：宋代士人尚醫風氣的延伸 ——「棄仕為醫」者的出現	162

## 2 兩宋的「尙醫士人」與「儒醫」

第三章：宋代的「儒醫」	179
第一節：「儒醫」稱謂的出現	181
第二節：「儒醫」詞義在南宋的延續	197
第三節：「儒醫」身份的轉化與宋代的醫、士關係 ——以《醫說》作者張杲爲主的個案研究	206
第四章：金元士人的「尙醫」、「爲醫」與 「儒醫」稱謂的延續	225
第一節：金元士人的「尙醫」思想與風氣 ——從「思想淵源」與「醫士關係」的角度談起	229
第二節：金、元時期的「士人爲醫」現象	256
第三節：「儒醫」稱謂在金、元的流變	281
結 論——傳統中國習醫者身份結構的轉變	299
【徵引書目】	309
【圖表索引】	
圖一：宋代尙醫士人細部分劃圖	39
圖二：張杲家族醫學傳承簡圖	208
圖三：士人棄仕爲醫簡圖	256
表一：兩宋官方醫籍編校暨刊印簡表	62
表二：南宋理宗開慶元年慶元府惠民和劑局收支簡表	94

表三：宋代士人素問相關著作表·····	134
表四：宋代士人難經相關著作表·····	134
表五：宋代士人脈學著作表·····	134
表六：宋代士人針灸學相關著作表·····	135
表七：宋代士人傷寒論相關著作表·····	136
表八：北宋士人諸家方論著作表·····	137
表九：南宋士人諸家方論著作表·····	141
表十：宋代士人小兒方論著作表·····	146
表十一：宋代士人婦人方論著作表·····	147
表十二：宋代士人外科方論著作表·····	147
表十三：宋代士人本草著作表·····	148
表十四：〈歷代醫學姓氏〉醫者分類表·····	179
表十五：金、元士人醫學著作簡表·····	239
表十六：金元明初文集所錄金元士人贈予醫者 之篇章簡表·····	241
表十七：《金史》〈選舉志〉所載諸科「會試」 「府試」錄取比率表·····	259



# 緒 論

## 第一節：民國以來「中國醫學史」研究方式的省思——以本國學界為中心的論述

「醫」與「史」的連繫，在中國可說是由來已久。從託名上古聖人的《黃帝內經》<sup>①</sup>，到博採古人議論的《脈經》與《外臺秘要》<sup>②</sup>，再再顯示出傳統中國醫學「重史」的傾向。然而，上述中國醫學的「重史」性格，卻並非直接源自於「史學」本身，而是導因於醫家臨床証治時的需要，實非有心將「醫學」放在「史學」的脈絡中加以研究<sup>③</sup>。因此，嚴格的說來，「醫學史」在中國之成爲一種學術研究傳統，應該還是民國以來的事<sup>④</sup>。在此之前，內容涉及中國醫學範疇，且含有「歷史」意味的相關著述，其性質大多屬於以「人物」爲主的「醫家傳記」。近代日本醫籍目錄學家多紀元胤《中國醫籍考》、岡西爲人《宋以前醫籍考》兩書所收錄的「醫史」著作，便屬於此類<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以傳統中國醫學爲歷史研究課題的風氣，之所以形成於民國初年，實與當日外國醫學史研究方式的傳入，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陳邦賢，這位被當代醫學史家譽爲「中國醫學史創

## 2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始者」的醫學史研究先驅<sup>⑥</sup>，在其出版於民國九年(1920)的《中國醫學史》一書中<sup>⑦</sup>，即曾明言其寫作動機，是受了國外相關學風的刺激。該書〈自序〉云：

嗚乎！史所以紀事者也。世界昌明之國，莫不有醫學史、疾病史、醫學經驗史、實用史、批判史等，以紀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進化之理由，且以醫史學為醫學中獨立之科學。吾國昔時亦有李濂《醫史》、甘伯宗《名醫傳》，發皇往哲之奧竅，然咸秉傳體，不過較「方技傳」為略詳耳。吾國數千年之醫學，豈區區傳記遽足以存掌故、資考證乎哉！此邦賢之所以發奮編輯《中國醫學史》也。晚近世界研究醫史學之問題，可分為三大類，一關於醫家地位之歷史，一為醫學的知識之歷史，一為疾病之歷史。邦賢斯編，亦本此意。<sup>⑧</sup>

從這篇自序中可知，陳氏撰著《中國醫學史》的原因，主要是有感於傳統醫學史研究在內容與體裁上的貧乏。他認為當代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應該仿效「世界昌明之國」的醫學史研究方式，以「醫家地位史」、「醫學知識史」與「疾病史」做為研究的主題，以便照顧到醫學發展過程中的諸般面相。從全書的內容觀之，陳氏基本上是以對歷代官方「醫事制度」的研究，做為他「醫家地位史」的主要內容；以「歷代著名醫學家」、「醫學家之學說」、「醫學家之著作」、「醫學流派」與「中外醫學交流」，為其「醫學知識史」的探討重心；至於「疾病史」的研究，則以對歷代疾病名候的「疏義」為主。

事實上，促使民國初年醫學史研究開展的原因，還不止於上述國外醫學史研究方式刺激之一端，當日甚囂塵上的「廢止中醫風

潮」(或稱之為「中西醫論爭」)，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這種自晚清逐漸勃興的論調<sup>⑨</sup>，在民國初年開始落實於政策的層面，1911、1929、1936年三次由中央政府發佈的「廢止中醫」禁令<sup>⑩</sup>，即為其具體表現。面對國民政府以「西醫」為主的醫療政策取向，操持傳統醫學技藝的中醫與一部份支持保存中醫的人士，也展開了救亡圖存的運動，在這二十餘年中，他們除了以實際的請願活動來表達他們的反對態度外<sup>⑪</sup>，也透過對「醫學史」的研究來說明傳統中國醫學的內涵，並強調其繼續存在的價值<sup>⑫</sup>。這些「衛道者」的醫史著作，除了少數單獨出版的專書外，絕大部份都發表在當日為數眾多的中醫期刊雜誌上<sup>⑬</sup>；其中，張贊臣在《中國歷代醫學史略》〈序言〉中的一段話，最足以說明當日這類人士的著述目的：

蓋依據社會發展之規律，考察歷代先哲之勞動成果，與夫當時之社會條件，其所影響於醫學者。尋本溯源，究其進退之由，以為未來行動之指針，固舍此莫屬也！<sup>⑭</sup>

引文中張氏所謂的「尋本溯源，究其進退之由」，正是當日眾多「中醫衛道者」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真實寫照，而他們共同的目的，則是在藉著這種「寓醫於史」的管道，尋求傳統中國醫學持續生存的契機<sup>⑮</sup>。

當時由此類支持保存中醫人士所撰著的「中國醫學史」著作，在課題的選擇上已頗為廣泛。舉例而言，如謝利恒刊載於《醫界春秋》、《國醫公報》上的〈中國醫學源流論〉<sup>⑯</sup>，是屬於綜論中國醫學發展過程性質的文章；王一仁發表在《中醫雜誌》上的〈古今醫說平議〉<sup>⑰</sup>，屬於「醫學流派史」的論著；范行準在《中西醫

#### 4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藥》上撰寫的〈古代中西醫藥之關係〉<sup>⑩</sup>，屬於「中外醫學交流史」的範疇；張錫純在《山西醫學雜誌》上撰寫的〈三焦考〉<sup>⑪</sup>，屬於「醫學理論史」的領域；溫敬修在《國醫公報》上撰寫的〈針灸沿革漫談〉<sup>⑫</sup>，屬於「治療技術史」的性質；曹炳章在《國醫公報》上所發表的〈中華本草歷代變遷〉，屬於「本草藥物學史」的性質<sup>⑬</sup>；張又良為《蘇州國醫雜誌》所撰寫的〈女科醫籍考〉<sup>⑭</sup>，屬於「專科醫學史」的範疇；而王吉民在《中華醫學雜誌》上撰寫的〈中國梅毒之起源〉<sup>⑮</sup>，則屬於「疾病史」的範疇。

就討論課題的類型而言，1911年至1949年間因「廢止中醫風潮」刺激而大量出現的「中國醫學史」單篇論文與專書，其論題大抵與前述受外國同類著作影響而成書的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相似，都有著重於「傳統中國醫學」本體研討的傾向<sup>⑯</sup>。不過，這些單篇論著與陳著《中國醫學史》在研究課題上所展現的雷同之處，並非全然是受了陳書的影響（有許多單篇論著的發表時間早於陳書），它們彼此間共同點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這股學風形成的原因本身。因為，不論是國外內容豐富的醫學史研究方式，抑或是國內日益茁壯的西方醫學勢力，都使得有心從事研究或保存中國醫學的人士，深感固有傳統的不足，要振衰起弊，當然先得從傳統中國醫學的內部著手。對醫史研究者而言，中國過去「醫學史」體例的貧乏與簡陋，使得他們必須將「傳統中國醫學」的學理變遷融入論述的內容；而對中醫衛道者來說，面對西方醫學的強勢衝擊，他們也必須透過對「傳統中國醫學」遭遞過程與理論精義的探討，來證明固有醫學是在前人不斷的努力下，累積熔鑄的寶貴經驗遺產，並進一步為這種醫學的繼續存在，建立歷史與學理上的依據。而就在上述

這兩種因素的推動下，近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方向」，在起始之初，便被定位在「醫學」的本體之上，而較少有其它層面的關懷。

1949 年之後，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巨變，上述形成於民國初年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方向，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又各自有其發展。以大陸地區為例，由於中共的醫療政策，基本上採行的是中、西醫並行的制度，因此有關「中國醫學史」的研究風氣可說是十分蓬勃的。就專業研究機構而言，自 1951 年成立第一個「醫史研究室」（該單位於 1955 年併入「中國中醫研究院」）後，又相繼在上海、陝西、湖北、遼寧等地成立中醫研究所，到 80 年代中期已有二十多所中醫院校及醫史研究所。從事醫史研究工作的學者，也從 50 年代的五十餘人，增加到 80 年代的五百多人<sup>⑤</sup>，四十餘年間所發表的論文專書，總數達到 18000 種之多；充沛且專業的研究人力，是維繫大陸地區「中國醫學史」研究於不墜的最主要原因。

關於大陸地區自 1949 年以來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方向，李經緯撰有〈中醫學史研究進展〉一文<sup>⑥</sup>，系統性地介紹了大陸自 1949 年至 1989 年以來，有關「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發展大勢。從李氏這篇文章所採用的分類方法觀之，四十年來大陸有關「中國醫學史」的研究論著（包括論文與專書），依其討論課題的性質，大抵可分為「醫學起源與分期史」、「各專科醫學史」、「疾病史」、「本草藥物學史」、「醫事制度史」、「醫學教育史」、「醫林人物」、「醫療技術史」、「少數民族醫學史」、「中外醫學交流史」、「醫學考古」等十一個方面。若將上述這些面相所涉

## 6 兩宋的「尙醫士人」與「儒醫」

及的醫學史研究層面，與前述民初相關研究的課題類型加以比較，則 1949 年以降的大陸地區「中國醫學史」研究，除了「少數民族醫學史」與「醫學起源與分期史」屬於較新穎的研究領域外<sup>⑳</sup>，基本上仍然承繼了民國以來的研究傳統<sup>㉑</sup>。

然而彼岸的「中國醫學史」研究，為何與民國初年（1949 年以前）的同類研究，出現論述題裁上的雷同現象呢？個人以為，這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民初相關學風的影響，但大陸學者的「研究目的」，恐怕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甄志亞便曾在〈關於我國醫學史學研究目的和任務的回顧與探索〉一文中指出<sup>㉒</sup>，大陸學者在本世紀 50 至 80 年代這三十年間，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目的不外兩點：一是以「發展中國醫藥學為目的」，二是以「掌握中醫藥學發展規律為目的」。甄氏認為，研究者採用上述第一個研究目的的動機，除了在藉由對古典中醫學說的研究，促進當代「中國醫學」的發展外，更含有提昇「民族自信心」的用意<sup>㉓</sup>；至於以後者為研究目的的學者，則意在探究造成歷代中醫學說演進遭變的經濟、政治與思想因素，並將之歸納為一套「發展規律」，以為未來「傳統中國醫學」發展的龜鑑<sup>㉔</sup>。

事實上，若從前述甄志亞所指陳的兩點「研究目的」觀之，大陸「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實用傾向」，可說是十分明顯的；而也正因為這種「實用目的」的存在，使得近四十年來大陸地區「中國醫學史」研究，在論說題裁的選擇上，也有著偏向對於「醫學」本體研究的現象<sup>㉕</sup>。而當我們將這個「現象」，放在自民國以來漸成風氣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傳統中考量時便可以發現，1949 年以降的大陸「中國醫學史」研究，在「目的」與「動機」的層面上，

似乎更類似民初的「中醫衛道者」們，因為這兩者所秉持的「研究目的」，均是在透過醫史研究的方式，謀求「中國傳統醫學」的沿續與發展，而他們的「研究動機」，則又都具備著「實用」的意涵。

總的來說，大陸的「中國醫學史」研究，由於研究者大多出身於中醫專門院校<sup>33</sup>，具有中醫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再加上其「實用」取向的研究「目的」；所以，若就其研究的屬性而言，與其將1949年以來彼岸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劃歸於「史學」研究的範疇，倒還不如將之視為「中醫學」的一部份，要來得更恰當些。蓋在今日的大陸醫史研究者中，能夠如民初陳邦賢一般，純粹抱持為「醫學」而「作史」的著述心態者，雖非全然沒有，但也不過是鳳毛麟角的個中異數罷了<sup>34</sup>！

前面曾經提及，民國以來的「中國醫學史」研究風氣，除了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持續傳承外，其在臺灣地區也有若干的發展。不過，與大陸稍有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在官方政策傾向建立以西方醫學為主體的醫療體系的影響下，始終未能在「醫學」（包含「西醫」與「中醫」）的專業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四十年來的相關研究論著，極少是出於中醫專業人士之手<sup>35</sup>。因此，嚴格的說來，臺灣地區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在學術的劃分上，與正統「中醫學」的關係是較疏遠的，而比較趨近於「史學」的範疇。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臺灣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學者，絕大部份均具有「史學」的專業背景，因此在論題的選擇上，常與個人的「史學關懷」有較密切的關係。在這種「關懷」的影響下，本

## 8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地學者的研究方向，大抵可依其對「中國醫學」在「史學研究」上的「定位」，粗分為「科技史」<sup>36</sup>與「社會史」兩種類型。

關於臺灣地區以「科技史」角度，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學者，依其研究內容，又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中醫學」本體為研究重心的學者，他們較注意「醫學理論史」、「醫學流派史」、「醫療技術史」與「疾病史」等方面的研究，陳勝崑即這類學者中的典型<sup>37</sup>；另一派則著重對歷代「醫事制度」的研究，黃克武、任育材、葉鴻瀾等人可為其代表人物<sup>38</sup>。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派學者在研究課題的選擇方面，與前述民初及大陸從事同類研究的學者相較，雖然並沒有太大的出入，但由於他們是將「中國醫學」放在「科技史」的研究脈絡中加以求索，再加上本身皆具有史學研究方面的專業素養，因此其研究也展現出民初及大陸相關研究所缺乏的兩點特色：一、他們都企圖以「中國醫學史」為例，回答「中國科技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 即傳統中國文化與官僚制度對「科學」發展的正負面影響<sup>39</sup>；二、他們在論述上多能恪遵史料，就事論事，很少會做過多的引伸與推論<sup>40</sup>。

以「社會史」研究取徑，探討傳統中國社會中各種與「醫療」有關的歷史，是晚近臺灣史學界所興起的一種研究態度<sup>41</sup>。受此一風氣影響的研究者，關心的是「生生之具」（維護生命的方法）所體現的歷史、社會現象及文化意義。在這樣的研究視野下，所有與中醫發展有關的事物，都成為討論的課題，而不僅限於對「傳統中國醫學」本體的研究。

嚴格的說來，前述這種以「社會史」角度為論述主幹的「醫療史」研究，在定義上不但很難與以往的「醫學史」全然等同，也無



法周全地類歸於其它性質的歷史研究中；例如，杜正勝在〈形體、精氣與魂魄 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一文中<sup>②</sup>，對古代中國關於「人」的幾種理解，有相當細緻的梳理。從表面上看，這樣的討論似乎已是「思想史」的研究模式，但杜氏此文卻又觸及「醫學起源」的課題。又如李建民〈馬王堆漢墓帛書「禹藏埋胞圖」箋證略稿〉一文<sup>③</sup>，談的是馬王堆所出土的「禹藏埋胞圖」，這篇文章既有考古研究的性質，又有「數術史」的旨趣，更有著「幼科史」的面相，而作者此文的最終關切，則是先民對生命所抱持的態度。再者如林富士〈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一文<sup>④</sup>，其內容不僅涉及了「疾病史」的範疇，也包含了對「療疾信仰」的「宗教史」研究，古人對「疫」這種特殊疾病的「認識」方式，顯然是作者所要討論的最終問題。

前述以「社會史」角度為取徑的「醫療史」研究，之所以會出現難以歸類的現象，主要是來自「研究角度」的差異；不同於以往各類「專門史」專注單一「本體」的研究方式，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sup>⑤</sup>，更著重從「文化」的角度去解析「醫學」的表裏。因此，其研究成果的性質，也往往因為「文化」原本所具有的複雜內涵，而呈現出不同的面相。

個人以為，自 20 年代陳邦賢以通史的體例，撰著本世紀中國的第一部《中國醫學史》起，到 90 年代相關研究的方興未艾，「中國醫學史」的研究，雖然幾乎已跨越了 2/3 個世紀；然而，除去前述最後一項「社會史」角度的「醫療史」研究取向不談（此一研究風氣的形成，自有其「社會史」研究的淵源）<sup>⑥</sup>，當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檢視這個研究傳統時，便會發現它的「走向」與